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符号与空间：灵力的政治经济学



名字与神灵

纳日碧力戈

阿嵯耶观音与南诏大理国的祖先历史叙事

安琪

官之祭典与民之俗信

——以山东长岛为例探讨标准化理论的再应用

马惠娟

民间儒教的窘境生成

——论中国农村家屋的空间与道德中心

石汉

日本关于汉人农村的「共同体」论与「祭祀圈」论

——回顾与展望

川濑由高



CHINA STUDIES **No.19**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研究. 2014 年. 春季卷: 总第 19 期 / 周晓虹,
谢曙光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97-6477-0

I. ①中… II. ①周… ②谢…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
中国—现代—丛刊 IV. ①D66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0467 号

中国研究 (2014 年春季卷总第 19 期)

主 编 / 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胡 亮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477-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列为序）：

Anagnost, Ann（美国华盛顿大学）
边燕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Christiansen, Flemming（英国利兹大学）
Duara, Prasenjit（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风笑天（南京大学）
Friedman, Edward（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关信基（香港中文大学）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
Houlden, Gordon（加拿大爱尔伯特大学）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强（清华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
林 南（美国杜克大学）
刘 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马 戎（北京大学）
Mohanty, Manoranjan（印度德里大学）
Perry, Elizabeth（美国哈佛大学）
乔 健（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 Charle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 Jonat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 Ezra F.（美国哈佛大学）
汪 晖（清华大学）
王康武（新加坡国立大学）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园田茂人（日本东京大学）
翟学伟（南京大学）
张玉林（南京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周 怡（复旦大学）

主编：
周晓虹 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周培勤

编辑：
杨渝东
陆 远
郭 未

英文编辑：
秦 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 1949 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 1978 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 19、20 和 21 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人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

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目 录

发刊词	1
-----------	---

主题研讨：符号与空间：灵力的政治经济学

“符号与空间：灵力的政治经济学”专题主持人语	杨德睿 / 1
------------------------------	---------

名字与神灵	纳日碧力戈 / 4
-------------	-----------

阿嵯耶观音与南诏大理国的祖先历史叙事	安琪 / 11
--------------------------	---------

官之祭典与民之俗信

——以山东长岛为例探讨标准化理论的再应用	马惠娟 / 23
----------------------------	----------

民间儒教的窘境生成

——论中国农村家屋的空间与道德中心	石 汉 / 37
-------------------------	----------

日本关于汉人农村的“共同体”论与“祭祀圈”论

——回顾与展望	川濑由高 / 56
---------------	-----------

学术论文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家庭“希望空间”：绵延与变形	祁 林 / 82
------------------------------	----------

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基于对 J 市一个客家村落的调查	易文彬 周云水 / 100
--------------------------	---------------

全球价值链上的劳工：以中国足球制造行业为例	薛 红 / 110
“消费模范”：城市中国的美女博主、日常专家以及治理术	伍 宁 / 139
升格的策略分析 ——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个案研究	贺晓星 王辛子 宦菁 / 159
韦伯“中国命题”与儒家传统文化研究 ——杜维明与黄宗智思想理路辨析	杨国庆 郑 莉 / 180
书评与对话	
中国乡村政治中的庇护主义 ——读戴慕珍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乡村治理中的政治 经济学》	夏少昂 / 198
有关“宗教市场理论”的一次圆桌讨论	渠敬东 卢云峰 梁永佳 等 / 208
英文目录与摘要	228
稿 约	233

“符号与空间：灵力的政治经济学” 专题主持人语

杨德睿*

宗教人类学究竟想解答什么问题？在“宗教”一词的意义早已被极度分歧的所指给稀释到几乎破产的今日，或许最简单直白的答案就是，“不同于一般物理力的灵力（efficacy 或 spiritual power）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周流运动的？它造成了什么影响或后果？”这三个问题。不论是真实还是类比，从方法论上来讲，灵力确实可以被构想为一种力、一种资源、一种价值，所以上述的三个问题所追问的，其实就是这种特殊的“力”或“资源”或“价值”的生产、流通、消费和这整套运行过程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效果——也就是灵力的政治经济学。

本期主题研讨部分的五篇文章都是在 2014 年 4 月 25 ~ 26 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与日本东亚人类学会联合主办、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东亚公共人类学恳亲会协办，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召开的“宗教与文化”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上发表的会议论文，它们分别展示了灵力的政治经济的生产面与流通面。

纳日碧力戈教授的《名字与神灵》是最集中探讨灵力的产生过程的一篇，他以吉林九台市小韩村满族石姓家族的“神抓萨满”仪式为例，聚焦阐释了通过呼唤神名来结合“精神”与“形物”这套法术为轴心的灵力生产过程。相较于纳日教授对于语言的施为之力的情有独钟，安琪的《阿嵯耶观音与南诏大理国的祖先历史叙事》一文则阐发了图像在灵力生产方面的类似潜力。她以南诏国王隆舜（877 ~ 903 年）运用阿嵯耶观音形象来使自身神圣化及他所代表的王朝为例，清晰地证明了：在最受纳日教

* 杨德睿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yangdr@nju.edu.cn）。

授重视的命名、呼名程序（改年号为嵯耶、改自称为转轮王“摩诃罗嵯耶”）以外，图像也是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灵力的重要机制——比如隆舜亲自粉墨登场演出“淋盆”仪式并要画工描绘此一情景，而使其成为《南诏图传》第七化“帝王礼佛”和《梵像卷》第 55 开，然后，在隆舜与阿嵯耶观音的“佛王同体”已经“有图为证”的基础上，再大造阿嵯耶观音金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他借由图像与神明通过建立起的联结而博得的灵力扩大再生产。当然，隆舜的灵力生产并不能仅靠操作称名和图像，这些操演是建立在他的祖上劝丰佑等诸先王下令编纂的历史/神话叙事以及对南印度金刚乘经典范式/规制的袭用之上的，而这两种培养灵力的铺垫手段，正好也是山东长岛天后宫案例的核心。在《官之祭典与民之俗信》一文中，马惠娟描绘了长岛的民众如何通过“编纂神话历史叙事”持续地再生产显应宫的灵力，使得这个灵力的种子得以挺过 20 世纪的多次灭顶之灾而保存至今，然后在 21 世纪通过袭用明清祀典、台湾民间信仰惯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种“经典范式/规制”来扩大其灵力的生产。

与着重言语、图像等符号的灵力生产效果的前三篇不同，石汉（Hans Steinmüller）的《民间儒教的窘境生成——论中国农村家屋的空间与道德中心》和川濑由高的《日本关于汉人农村的“共同体”论与“祭祀圈”论》聚焦于空间与灵力生产和流通的关联。石汉引用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对中国风水实践的“中心化”“连接”与“集中”三种仪态论，分析了湖北恩施巴山地区农村民众如何通过家屋的建筑、装饰和仪式场合（婚、丧、祭、宴客）的空间设置，生产出具有或者代表灵力的神圣空间中心。尽管他的论述重点在于神龛与毛主席画像的摆放位置如何造成了当地人的“窘态”，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出：在巴山人民的文化逻辑里，灵力生产的关键在于空间（space）的设置和运用而不是装置物（神龛或毛像）本身的属性，然而，被赋予了灵力的装置物，其本身属性/形态却有可能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构成地方意识的基础（石汉称之为“文化的私密性”），从而有助于“地方”（place）的生产。可是，灵力在流通中的体现形态真的能生产出“地方”来吗？这正好是川濑由高论文的核心问题。这篇论文详细地梳理了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民间宗教与地方社会的各种重要论点，通过这番回顾，我们可以概略地看出灵力在中国民间流通、散布的轨迹并不足以构成“共同体”的实在基础，但是它确实能通过“中心化”的实践影响民众主观的地理学。站在这一点上回看前三篇文章，我们将能清楚地看出它们对灵力之空间意义的暗示或企图，比如纳日教授在结尾处提到“排神”时再现的神圣地理学，安琪针对阿嵯

耶观音崇拜的描述反映了南诏“去唐化”并融入东南亚文化圈的意图的论断以及马惠娟对长岛显应宫积极加入以闽台为中心的妈祖文化圈的描述，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灵力的生产和流通网幅员的设定或想象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意涵。

总结上述，这五篇文章具体而微地展示了中国的灵力政治经济学的复杂性，一方面涵盖了从称名、图像、神话历史到经典范式/规制等各种生产灵力的机制，另一方面罗列了从家户、自然村到东南亚文化圈、妈祖文化圈等种种大小不一的灵力流通疆域。这五篇文章或许能帮助读者很快地意识到中国宗教人类学这一领域的宽度。

（责任编辑：杨渝东）

名字与神灵*

纳日碧力戈**

摘 要：命名是民间超度仪式中的关键环节，是神灵信仰的操演实践。本文利用奥斯汀的言语施为理论，讨论呼名唤神的行动意义，尤其是萨满仪式中名字与神灵之间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萨满 名字 神灵 言语施为理论 操演

名字与意义

哲学上关于专名的讨论分为两个流派。以英国哲学家穆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名字是没有意义的标记，专名涉及所指对象本身，不涉及特征（Mill, 1974: 979 - 981）。以德国哲学家弗雷格为代表的另一派则相反，认为专名有所指，也表达意义：两个专名可以有相同的所指，但意义却不一定相同；两个专名的意义相同，其所指对象必相同（李幼蒸，1993: 214 ~ 223）。英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同意专名有意义这一观点，认为被意指的客体就是该词的意义，而“专名的意义即其所指称的客体”（李幼蒸，1993: 216 ~ 217）。持自然语言观的克拉提鲁斯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正名”，即命名是非任意性的，事物的名字要符合事物的特性或者特征；赫尔墨吉尼斯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各民族关键符号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AZD05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0AMZ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国崛起与应用人类学研究美国经验的启示”（项目编号：11JJD810012）和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贵州苗族民俗风情研究”（项目编号：黔省专合字（2013）38号）的阶段性成果。

** 纳日碧力戈博士，贵州大学长江讲座教授（naranbilik@163.com）。

成的关系，不存在内部关联（Plato, 1926: 7-9）。苏格拉底指出政治因素在命名活动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奴隶既不能为自己取名，也不能为主人取名，就是说并非每个人都有权力为自己或者他人命名（Bodenhorn and Bruck, 2006: 5）。中国古代有孔子的“正名”说和墨子的“取实予名”说之间的对立。《管子·九守》篇提出“名生于实”“按实而定名”的论述。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白马非马”的观点：“马者，所命名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即“马”表形，“白”表色，“白马”为二者结合，因而“白马非马”。荀子认为“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即专名受社会历史习惯制约，一旦“约定”，个人就不再任意改动（任继愈，1973: 171）。

名字指称对象也表示与所指对象有关的社会脉络。塞尔（John Searle）认为上下文或者社会脉络可以产生名字意义，称之为“描述性后援”（descriptive backing）（Searle, 1958: 166-173）。克里普科（Saul Kripke）提出与其相反的观点，认为专名属于“严格的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尼克松”也好，“金星”也好，终究还是“尼克松”和“金星”，并不因为有所上下文信息而有所改变（Kripke, 1980: 104-135）。不过，民族志材料已经证明，文化群体不同，对于名字的认知也会有所不同，任何关于专名的普遍理论都不能绕开比较民族志。里柯认为命名是言语活动：一方面词汇意义是开放的，指向经验世界；另一方面词汇受语法制约，只有服从具体语言系统的自指逻辑（self-referential logic），意义才能成立（Ricoeur, 1976）。威尔逊（S. Wilson）、尼克莱森（W. F. H. Nicolaisen）和霍兰（T. H. Holland Jr.）也都认为命名是言语活动，认为专名（名字）不仅仅指向自己，并且在语法的支配下指向词汇的社会意义（Wilson, 1998）（Bodenhorn and Bruck, 2006: 8）。

本文旨在讨论命名和呼名的仪式，再次证明名字兼有所指和意义，命名和呼名与文化场景和社会脉络紧密相关，在综合互动的过程中，生成或者再生成社会意义。

奥斯汀的言语施为理论

语言不仅用来描述，还用来做事，这是马林诺斯基的观点。无独有偶，与马氏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奥斯汀（Austin）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而且其观点更加精细和复杂（Searle, 1970）。他专心研究日常语言本身，注意语言使用中词义的细微差别，认为这种研究是哲学研究的起点。他认为，

除非是分析命题，否则命题的正确与否不取决于它自身，而是取决于命题时的环境，被说出的命题由于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充满不确定性，没有任何命题可以被直接证实，既不可以拒绝修正，也不可以独立于环境为自己提供证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说出语句时完成的行为”分为三类：言语行为，即用语句传达思想；以言行事，如许诺、命令、陈述、描述警告等；以言取效，即通过说出语句而产生效果。奥斯汀提出哲学的使命是阐释，阐释即言语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2000）。

研究言语行为要首先研究“成事动词”，“成事动词”句“语用力量”大，主语为第一人称，“时间为瞬息的现在”，受事者用第二人称，句子用肯定语气（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2000）。例如，

我肯定他拿第一。

我把这类社群归入民族。

我命令你走开。

我保证不再喝了。

我谢谢您了。

我宣布开幕式现在开始！

例中“肯定”“把”“命令”“保证”“谢谢”“宣布”为“成事动词”。当然，成事动词句中用第一人称的说话人要有适当的身份、有一定的权威和权力，才能“成事”，否则说了也白说。例如，法庭上由法官判决，而不是由辩护律师判决；教堂里由神父宣布新郎、新娘为夫妻而非双方父母；开会时由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而非普通与会者。言语活动是规则化行为，学用一种语言就是学会其相应的行为规则。我使用母语做上述描述的时候，我不是在报道某种群体行为，而是在展示我所掌握的规则化技艺（Searle, 1970: 12）。此外，我们心里想说的总能表达出来，即便是用外语，开始可能水平不够，说不出来，但经过学习提高，就能说出来了（Searle, 1970: 19）。同样的道理，我们用母语描述民族志材料或人类学理论的同时，也是在展示我们自己的文化规则，这是一种文化行为，受到文化视角和“偏见”的制约。即便如此，母语不同者之间仍然可以交流，只要他们能掌握对方的文化规则，掌握语言行为的场景（或时空关联），交流就能成功。不管说什么语言，交流总会产生意义。具体场景使母语不同者能超越语言文化的界限而互相理解。言语行动在许多民族志社会有特殊意义，如马林诺斯基所言，它是行为方式，是人们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命名和呼名涉及施为语。父母或者其他长者给婴儿命名，其行为本身属于施为活动；在呼唤神灵的仪式上，呼名得到应答也属于施为活动。

命名与神灵

如果我们从命名入手，而不是纠缠于固着化的专名，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说话的环境、说话者的身份、其意图等因素如何影响名字当下的意义。此外，根据民族志的记载，在呼唤神灵的仪式上，每一次呼唤神名，都相当于一次命名活动。在马达加斯加，没有被呼唤的神灵是无影无踪的，而仪式专家对于神名的呼唤，则能使之借助附体而具形现身——命名或者名字的呼唤赋予潜在的神灵以真实的身份，让他们和在场者的五官发生联系，产生“物象”（Lambek，2006：115-138）。呼唤神名是宗教活动中司空见惯的行为，无论是祈祷、献祭，还是赞叹、诅咒，神名无处不在。萨卡拉瓦人（Sakalava）祈祷时先以念诵一长串最高神和普通神的名字开始；丁卡人（Dingka）在吟唱赞美诗的时候，呼唤他们的神灵；犹太教用间接的方式呼唤上帝之名（Lambek，2006：118）。呼唤神名是唤起神力的必要手段；命名把所指对象固定下来，每次呼唤都要“验明正身”，确定这是本人而不是其他人。命名是“呼名取实”的过程，通过呼唤和应答来确定神灵的物质存在，以“神”定“形”，以“形”辅“神”。

满族石姓家族的“神抓萨满”仪式^①颇能说明命名与神灵之间的关系。^②整个仪式分家祭和野祭两个部分举行，家祭与祖先神有关，野祭与动植物神有关，都要通过吟唱神歌、呼唤神名、“走托力”^③来完成。边“走托力”边呼唤神名，被呼唤的神灵是否答应决定着萨满的神歌是否灵验，即决定着神歌是否属于有效的“施为言语”。即便萨满有确定无疑的身份，场合和仪式程序也正常，但被呼唤的神灵照样可以拒绝应答到场，从而使呼名无效。所以，命名并非任意，并非呼唤之后就解决问题；相反，呼唤要有回应，否则命名就不能算完成。例如，举行“神抓萨满”仪式那一天^④，载力（助手）跪拜在神案前，端着一碗水吟唱领牲神祠，然后将水递送穆昆达（族长），全体族人在神案前跪下，穆昆达将水注入猪耳，出乎意料，猪耳没有抖动，说明有神灵拒绝到场。很快查明，有信奉

① 即萨满传承仪式。

② 笔者于2014年1月11~17日赴吉林九台市小韩村参加石姓家族“神抓萨满”仪式。

③ “托力”即铜镜，仪式专家用它来与神“对话”。铜镜面上涂酒，放一颗玻璃球（过去用东珠），玻璃球会在镜面上旋转移动，玻璃球的走势传达神的“旨意”，大萨满根据神的旨意选用合适的神器跳神。

④ 2014年1月14日。

“黄仙”者在场搅局，维持会议者立即请那些信奉“黄仙”者离场，好让仪式继续进行下去。果然，这次猪耳“遇水而抖”，大功告成。

在石姓家族的送神仪式上，萨满全身披挂，大神、二神同时击鼓，载力们也跟着击鼓，唱请神歌，请主事的五位太爷^①（Lambek, 2006: 129）降临，在萨满身上附体：二神问大神是哪位大神降临。萨满回答：本神是五位太爷。据关云德记载，吉林省九台市莽卡满族乡的尼玛查氏杨姓、东哈村的石姓及胡家乡小韩村的石姓，过去有放野神的习俗，野神有飞虎神、卧虎神、金钱豹神、鹰神、雕神、熊神、蟒神、狼神、白水鸟神和水獭神等，其中鹰神是第一铺神。放鹰神首先要排神，即“点将”。萨满披挂整齐，腰系铃铛，左手持鼓，击鼓后开始排神，将家族所供奉的各位神名逐一赞颂，邀请他们降临享用祭品，排神歌全部用满语唱诵。^②请神仪式上的舞蹈、腰铃声、击鼓声、吟唱声、香烟、神偶等等，让命名和呼名更加具有施为作用，让形物和精神完美结合，增添了真实氛围。这些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本身在“宣布着”“命令着”“保证着”^③（Lambek, 2006: 124）。小韩村石姓家族的神名各有自己的地缘关联，呼唤神名等于“身临其境”“……今桦甸与抚松交界处的头道江（上江）出‘玛克鸡瞒尼神’，白山水库大堤（老恶河）出‘按巴瞒尼神’和‘扎克他瞒尼神’，辉发河下游出‘胡牙乞瞒尼神’和‘胡阎瞒尼神’，红石砬子镇色洛河村色洛河出‘查憋布库瞒尼神’，金河乡密胜村密什哈河（尼什哈河）出‘伏亲瞒尼神’、‘舒录瞒尼双龙河神’、‘尼贞布库瞒尼神’、‘巴那额真瞒尼神’，北台子乡双龙村（双河）出‘朱录瞒尼神’，二道甸子镇地窖子河、木其河出‘梯梯库瞒尼神’和‘梯拉库瞒尼神’等”（尹郁山，2007: 3）。对于神名的呼唤，展现了“神圣地理”，“说”就是“做”，言

① 小韩村石姓家族太爷有七位：头位太爷属鼠，名号崇吉德；二位太爷属虎，名号打卡布；三位太爷属兔，名号乌林巴；四位太爷属马，名号东海；五位太爷属蛇，名号多明阿；六位太爷属牛（名号缺）；七位太爷（原文为六位太爷，疑为七位太爷之误）属龙，名号坤东阿。参见关云德《胡家小韩屯石克特里氏石姓放大神》，载九台市政协文教卫生委员会编《九台文史资料》（内部资料）第七辑，2012，第161页。尹郁山的《满族石姓萨满祭祀神歌比较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第6页所排列的七位太爷神，其中前五位与关云德所列相同，第六和第七换位，六位太爷不是属牛的无名者，而是属龙的坤东阿，属牛的无名者是七位太爷。同样，在Lambek关于马达加斯加岛的民族志中，皇族成员死后在神谱中变成各有其位、有名有姓的个体神。

② 关云德：《胡家小韩屯石克特里氏石姓放大神》，九台市政协文教卫生委员会编《九台文史资料》（内部资料）第七辑，2012，第162页。

③ 笔者同意Lambek所引莫斯的观点：与其说是给某人命名，不如说是把人和名字结合起来，或毋宁说是把人“送给”名字。

语即施为。

讨 论

命名和呼名有一个共性：其具有作为社会行动的施为功能。名字兼有所指和意义，绝非简单的“编码”或者人物个体的指代。如果我们从语言人类学出发，超越语言学语言本体研究的局限，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命名和呼名如何与文化场景、社会活动以及交流协商密不可分，如何成为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需要强调，本文所说的命名和呼名始终是一个对话过程，也是一个检验过程。首先，命名者和被命名者的社会身份要符合规范，命名者要有命名的“资质”，被命名者要符合被命名的要求，不能任意命名和被命名。其次，命名和呼名要“有呼有应”，不能“一厢情愿”，不能“有呼无应”。例如萨满呼唤神名，神灵不到场，导致呼唤无效，萨满则需要调整一下，继续努力。最后，命名和呼名的仪式过程，是一个“物性”和“神性”沟通的过程，其中有“神韵”，更有“物用”：萨满和仪式专家用到的“家伙什儿”、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残酷折磨”、精心安排和操演的程序以及其他要素和活动，都是形神协商对话所不可缺少的内容。萨满和仪式专家通过对于自己身体的操控，对于言语、器具、场所、人群、神秘乃至地理和天象的把握和活用，而真正把物象和神灵连为一体，交融与共。

可以说，命名和呼名是社会仪式过程的核心部分，从成丁礼到萨满仪式，从结拜兄弟到加入会社，命名和呼名是不可省略的重要部分。仪式中的命名和呼名，常常起到标志地位变化、划分群体的作用。^① 所以，命名和呼名的活动符合奥斯汀的言语施为理论，说话即行事，说话能成事。社会分类先从命名和呼名开始，每一次仪式活动都是对于先前社会分类的重温、再确认、再生产或再创造。

参考文献

- 李幼蒸，1993，《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任继愈，1973，《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① 如从死者名制度、命名成丁礼，等等。